

1931年,王明曾一度执掌中共中央最高权力。这年10月,他前往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。按传统说法,王明1937年回国是被共产国际派回来夺毛泽东权的。最近出版新编《王明年谱》的党史研究专家,用史料否定了这一说法。

# 王明为何与中央分庭抗礼十个月

## 回国本是要当毛泽东的助手

最近,新编《王明年谱》出版。该书作者、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认为:“王明从1933年就开始准备回国了,一是中共中央要求他回国,一个是共产国际要派他回国,而且他自己也要回国,1934、1935年一直给他安排,但都没有安排成,结果拖到1937年。王明在苏联学的是理论,需要他回去给一些人当秘书、当助手,所以王明回来要当毛泽东的秘书和助手,从理论上帮助毛泽东。王明1937年回来基本是基于这个原因,从政治上帮助毛泽东,建立统一战线,而不是为了夺权,至少他也没有想夺权。”

关于这一点,从共产国际的态度上也能得到佐证。王明启程回国前,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告诫他,“你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之一,但不要让共产国际书记身份出现,要尊重国内同志,尤其要尊重毛泽东同志”,“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,就是他们推选你当总书记,你也不要担任”,并强调,“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,不是你,你不要自封领袖”。

## 斯大林交给王明的使命

王明此次回国,除了上述原因外,还肩负着重要“使命”。

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,国共两党携手合作,斯大林却在打自己的小算盘。当时,苏联在西线已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对头,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,苏联就会两面受敌。苏联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,为此,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国民党政府身上。

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,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,于是决定派王明回国。在斯大林看来,只有王明才能“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”,不让“独立自主”搞得太离谱。

况且,季米特洛夫也叮嘱王明:“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,所以在统一战线中,不要刺激国民党,提出谁占优势、谁领导谁的问题,应当像法共那样,一切服从统一战线,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。”对唯书唯上的王明来说,其回国的使命就不言而喻了。这也正是他随后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重要原因。

## 在党内造成严重分裂

1937年11月底,王明夫妇来到延安。12月9日至14日,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。王明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,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、民生问题,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;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……这些意见,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,但由于他有“尚方宝剑”,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。毛泽东虽作了辩白和解释,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。

不久,王明来到武汉,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,把持了长江局。李德曾回忆说:“我们把华中局(即长江局)叫做‘第二政治局’。事实上,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,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,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,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

策。”

1938年2月,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王明竟附和国民党“只要一个军队”和“统一军令”的叫嚣,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。不久,毛泽东发表《论持久战》。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,让其在武汉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上尽快刊登,王明却一再阻拦,不予登载。王明这种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做法,在党内造成严重分裂。

## 受批评后极力赞扬毛泽东

1938年7月至8月间,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,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指示。9月14日至27日,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。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,尤其是“以毛泽东为首”的政治信息,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。

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,武汉失守,中共决定撤消长江局,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,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。王明留延安,任中央统战部部长、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,由此宣告了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时期的终结。而自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后,王明为扭转被动局面,极力地赞扬毛泽东。1940年5月,他在延安“泽东青年干部学校”开学典礼上作了《学习毛泽东》的讲演,一切好听的名词几乎都用上了,和林彪、康生等在“文革”前后的表现相比,毫不逊色。对毛泽东作出这么高的评价,王明是第一个。(据《世纪风采》、《新京报》、《王明中毒事件调查》)

## 延安时期选举采用“豆选法”

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根据地的时候,采用了一种“三三制”的政权模式——也就是说,在政府干部当中,共产党员、非党“左”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,各占三分之一,基层政权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。

在有关当时的一些电影资料中,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:一群敦厚、朴实的农民举行“豆选”。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一个粗瓷海碗,全村成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。他们有点腼腆,又有点陌生地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,如果同意谁当村长、乡长,就把豆子放在谁身后的碗里。最后,由得豆最多的人当选。

“金豆豆,银豆豆,豆豆不能随便投;选好人,办好事,投在好人碗里头。”这句上世纪40年代流传于延安地区的民谣,生动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在艰苦环境下运用“豆选法”进行选举的场景。

豆选连同烙票、划杠等淳朴的投票方式,演绎着生动的草根民主,为日后人大表决所借鉴。土改后农民选举人民代表,因为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,也多用“豆选法”。

(据《老人报》)

## 贺龙还烟钱

贺龙喜欢抽烟,而且爱抽旱烟叶。1937年,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,贺老总带了一些旱烟叶。没几天,烟叶抽光了。没有烟,贺老总实在难熬啊!后来,警卫人员叫后勤部的同志买来一些烟叶。当贺龙得知自己的生活费用光了,这烟叶是用公款买的时候,沉痛地说:“我贺龙犯了挪用公款之罪喽!”他对警卫员说:“你马上再给张司务长捎个信,告诉他,这一笔钱,一定要记在我贺龙的欠账上,不可用其他经费冲掉,会后如数补还。”说完,他还严肃地批评警卫人员:“红军的纪律,财务上的制度,你不是不知道嘛!怎么糊里糊涂,背着我干起这个无钱的买卖来了呢?”

贺老总为了补还那笔烟叶钱,与张司务长订了一个加倍节省个人生活开支的“合同”,每餐给他减盐、减油、减菜。有时,甚至端起碗吃“白饭”,不肯吃菜。就这样,贺龙一直坚持了两个月,才将那一斤半烟叶款如数还清。(据凤凰网)

## 周恩来和王明曾合办《南针》

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编《王明年谱》,出现了一些新材料、新看点,现摘编如下:

### 陈独秀不同意武装工农

1927年3月米夫率领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组到中国,关于他们的任务,据王明说主要有两个:一是帮助中共中央出版日报;二是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,时间为三至六个月,人数为三至五千人,培养从班级到连级的干部,准备成立三个军(15万人),由叶挺等各兼一个军的军长,实则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,真正地武装工农,并带来五万美元作开办费。蔡和森、瞿秋白、张国焘等人都对此表示支持,但由于陈独秀不同意,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。如果真像王明说的那样,当时马上举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,并马上扩军,这对于挽救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,是会起到重要作用的。

### 杜月笙也没能救出向忠发

王明说向忠发被捕是由他的女

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。他被捕后,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,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。但是两小时后,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,说杜月笙也没办法,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。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,把周恩来、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,并带敌人去捉人。幸而他们都搬了家,未遭逮捕。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,结果,该科工作人员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被捉去了。但蒋介石觉得向忠发利用价值不大,很快就把他枪决了。

### 1931年王明何以去莫斯科

关于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问题。过去很多著作都说是王明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,自己提出到莫斯科去。但据王明说,他这次到莫斯科,主要是因为顾顺章、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,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无法开展工作。他们虽然时常搬家,但仍然随时可能发生危

险。于是,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国际,共产国际决定调周恩来和王明一起去莫斯科,半年后再回上海。他们因工作无人负责,不愿离开。但国际不同意,屡电催他们早日离开,并派人来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。临行前,周恩来改变了计划,说他不愿去莫斯科,因为他不久前(1930年秋)才从莫斯科回来。于是,王明就于1931年10月18日启程赴莫斯科。

### 周恩来和王明曾合办《南针》

周恩来与王明曾一起编辑《南针》杂志。据王明回忆说:1931年9月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们去莫斯科后,他们觉得工作这样忙,哪能离开?于是两人商量:既不能出去活动,就在家编刊物好了,于是出了一个小型指导刊物,名叫《南针》。王明用韶玉等笔名,周恩来用苏广等笔名写文章,帮助干部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。可惜因为他们相继离开上海,《南针》只出了几期就停刊了。(据《老年生活报》)